

人民军队党委制的建立和发展

□ 刘 征 王忠华

人民军队党委制诞生于我们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实践探索中，确立于红军时期，后来随着革命形势的变化几度消长，新中国成立初期被明确为党对军队的领导制度。

（一）

南昌起义前后，我们党开始探索在军队中军师两级成立党委，支部则建在团级，军师团各级分别设立党代表，领导起义的前敌委员会也是党的组织，同时还借鉴了苏军的党团组织模式，在军队中设立党团，由革命委员会统一领导军事工作，党通过党团落实党的政策。由于只强调“指导”而非“领导”，使得党不能对军队实施直接的组织领导。党组织领导功能的弱化不仅严重阻碍了军事指挥，还对部队的思想稳定带来不利影响。

毛泽东通过领导三湾改编将全军交由党的前敌委员会统一领导。其中，各级部队分别建立党的组织，班排设小组、支部建在连队上、营团建立党委、连以上设党代表，部队一切重大问题都必须经党组织集体讨论决定，从而在组织上保证了党对军队的领导，确立了人民军队党指挥枪的铁律。这一创举把党的基层组织和军队的基层单位结合起来，使党的领导深入群众、抓住士兵。对此，毛泽东后来指出，“红军所以艰难奋战而不溃散，‘支部建在连上’是一个重要原因”。

（二）

1928年5月，宁冈会师一个月后，为有效指导营党委、连支部和士兵委员会开展政治工作和宣传工作，中共湘赣边特委和红四军军委决定，红四军在团以上各级建立党委机关，兼负政治部职能，组织指导政治工作和宣传工作，克服国民革命军中只是政治

部少数人做政治工作和宣传工作的弊端。同年11月，《红军第四军第六次党代表大会决议案》决定，“连上支部干事会应改称连支部委员会，扩大委员数量，使多数同志参加干部指导工作。切实做到连支委为红军核心”，进一步使党的领导贯通到基层。但是，随着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建设发展，红四军内部就党的领导、军政关系、军内民主等问题出现矛盾与争论。

1929年9月下旬，中央在经过多次谈话、讨论和研究后，逐步形成统一意见，委托陈毅起草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即九月来信），其中关于肯定党委制、要求实行政治委员制和民主集中制等相关精神后来成为古田会议决议的重要依据。12月下旬，古田会议决议明确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原则和以军队党委制为核心的领导制度，形成党委领导下军政分工负责的基本框架，为党领导军队根本制度的确立奠定了基础，党委统一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雏形初显。

1930年1月15日，中央军委主办的《军事通讯》创刊号全文发表陈毅写的关于红四军历史及其状况的报告，周恩来亲笔加了一段很长的编者按语，指出红四军对党领导军队的制度探索“在中国是独一无二的，在世界是未之前见或未之前闻的”，是“宝贵经验”，要求各地红军、各地方党组织都要学习和采用红四军的经验。在中央的大力宣传下，红四军党委制和党委建设经验得以在红军中推广。

（三）

由于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领导，1932年10月，中共苏区中央局全体会议决定取消红军中的党委制，以政治委员的个人领导取代党委的集体领导。党

委制的取消为全面推行“左”倾路线创造了条件，造成的后果“就是中央所在地区第五次反‘围剿’战争的失败和红军主力的退出中央所在地区”，被迫实施战略转移。

1935年1月，党中央在长征途中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即遵义会议），解决了党内所面临的最迫切的组织问题和军事问题，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中央的统治，确立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为党的集体领导制度的重建提供了条件，对红军胜利完成战略转移任务发挥了重大作用。长征胜利后，为进一步加强党对红军的领导，1936年12月7日，在《总政治部关于党的新任务面前红军政治工作的任务（草案）》中，以中央指示的形式取消了政治委员的“最后决定权”。

（四）

随着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正式形成，根据中央组织部规定，红军改编后，八路军在总部和师两级直属队及团、支队，新四军在支队和团分别组织建立党务委员会或党总支。

在新的革命斗争实践中，中央和军队党的各级组织愈发认识到党委制在党领导军队上发挥的重要作用。1944年4月11日，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谭政受毛泽东委托，在中共中央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上作《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报告，提出“恢复古田决议的党的代表会议制”的建议。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在向中共七大提交的《论联合政府》书面政治报告中指出，要争取光明的前途，就必须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11月，中共晋冀鲁豫军区第一次扩大会议决定在各纵队及各旅建立党委，翌年10月又决定

在团一级设立党委会，并颁布暂行条例，加强了党对军队基层单位的领导。

解放战争时期，党委制日渐完善。1947年2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军队中组织党委会的指示，肯定了此前晋冀鲁豫的改组经验，要求各部队在中央草拟的军队中党的组织条例尚未公布前，可根据此经验及其文件实行改组，并将经验电告中央。据此，人民解放军团以上部队的党委先后建立。7月28日，总政治部颁发了我军第一个党委会条例，即《中国人民解放军党委员会条例草案（初稿）》，对党委会的性质、地位、作用和组织原则等作出具体规定，并对军政委员会、党务委员会等原有党组织和制度形式的调整作出说明，有效推动了全军的党委建设。

1948年9月20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健全党委制的决定，指出：党委制是保证集体领导，防止个人包办的重要制度，今后从中央局到地委，从前委到旅委以及军区（军分会或领导小组），政府党组、民众团体党组、通讯社和报社党组，都必须建立健全的党委会议制度，一切重要问题均须交委员会讨论，由到会委员充分发表意见，做出明确决定，然后分别执行。同时指出，“还须注意，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二者不可偏废”。1949年3月13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总结讲话中提出12条“党委会的工作方法”，分别明确了党委组织原则、具体方法和工作作风，进一步推动了军队党委制的规范化。

新中国成立后，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于1954年4月15日颁布《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条例（草案）》，规定在军队中设立党的各级委员会，作为部队统一领导核心，并明确实行党委统一的集体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军队党委制得到坚持和巩固。



1938年3月16日，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在潞城县神头岭伏击日军，取得了歼敌1500余人的辉煌战绩，是八路军挺进山西抗战前线后一次规模较大的伏击战。如今，在山西省长治市潞城区神头之战纪念馆园内，巍然屹立着一座纪念碑。碑高15.8米，由碑座、碑身和碑顶三部分组成。碑身正面镌刻着徐向前亲笔题写的“神头之战纪念碑”7个鎏金大字，背面镌刻着碑文，全文如下：

一九三七年冬，日本军队已侵占我华北大部。八路军一二九师遵照中共中央指示，挺进晋东南，开展游击战争，创建以太行山为依托的抗日根据地。翌年春，敌十六师团、一零八师团，由邯郸沿武安、涉县、黎城、潞城、屯留一线进攻临汾。我三八六旅旅长陈赓奉师长刘伯承、政治委员邓小平之命，决定在浊漳河南岸的神头岭上打一场伏击战。三月十六日凌晨，我三八五旅七六九团猛袭敌之重要兵站黎城，驻潞城之敌迅即以步骑一千五百余人出援。九时半，援敌尽入伏击圈。我七七一团由北正面出击，补充团和七七二团东西猛烈夹攻，山梁公路顿作火海，敌被截为数段，进退维谷，穷突狼奔。我英雄将士猛扑敌群，与之短兵相接，殊死拼搏。激战两小时，沙场敌尸狼藉。午后，黎、潞救援神头之敌，于潞河、微子镇被我击退，歼其一部。是役，我军以伤亡二百一十余人的代价，赢得毙伤俘敌一千五百余人，毙伤缴获骡马六百余匹，烧毁汽车五部，缴获长短枪五百余支和其它大批军用物资的重大胜利，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史上谱写了光辉一页。为铭记革命先辈和死难烈士的不朽功业，昭励后人，继承革命传统，发扬爱国主义精神，特立此碑以志。

一九八八年三月十六日
潞城县人民政府 立

碑文分析了全民族抗战初期的形势，记述了神头岭伏击战的过程、战果及其深远影响，展现了八路军将士不畏强敌、不怕牺牲的战斗意志和前仆后继、为国为民的爱国情怀，书写了中国人民英勇抗战的光辉业绩，表达了对革命先辈的崇高敬意和缅怀之情，读来令人肃然起敬、深受感动。

主动出击，“吸打敌援”

1938年2月，随着山西敌后抗战局面的形成，日军华北方面军调用5个师团兵力，分4路发动夺取山西南半部的战役。其中，第一零八师团的苦来地旅团从河北邯郸西进，大举进犯晋东南。18日，河北通往山西的战略屏障东阳关失守。紧接着，日军沿邯（郸）长（治）公路大举向长治进攻。21日，长治城失陷。随后，包括壶关、屯留、长子、襄垣等县城相继被日军侵占，晋东南地区大部沦陷。

长治沦陷后，日军企图通过临（汾）屯（留）公路进一步西犯夺取临汾。为了阻击日军向西、向南发展，进而保卫陕甘宁边区，巩固刚刚建立的太行抗日根据地，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师长刘伯承、政委邓小平等反复研究决定，斩断邯长大道及临屯公路日军西进线路。邯长公路是日军从平汉铁路取得后勤补给的主要交通线路，日军在该交通线的各要点都有重兵防守。黎城是该交通线上日军的重要兵站，而黎城与潞城之间的丘陵地形对我军打伏击非常有利。根据此种有利地形，师首长决定主动出击，采取“吸打敌援”战术，命令第三八五旅第七六九团一部佯攻黎城县，引诱长治、潞城敌军来援，第三八

抗日战争中『典型的游击战』

——神头之战纪念碑碑文敬读

□ 张 涛

六旅在黎城、潞城之间设伏，伏击长治、潞城的援敌，给敌以歼灭性打击。

攻敌不备，山梁设伏

旅长陈赓接到作战任务后，第一时间召开了战前准备会议，分析了作战形势和特点，研究了具体作战方案。通过研究地图，大家认为神头岭地区地形复杂，岭窄沟深，不便敌人汽车、骑兵运动展开，且有旧工事和草丛，便于我军隐蔽突袭，是理想的设伏地点。到神头岭实地侦察后，陈赓发现，实际地形和地图完全不符，公路不在深沟，而是在山梁上，公路两边除有一些旧工事外，没有任何隐蔽物。这样的地形，既不利于部队隐蔽，更不利于部队进攻。经再次研究敌情和地形特点后，陈赓最终决定把伏击地点设在神头岭上。陈赓讲：“在独木桥上打架，对谁有利呢？”虽然山岭不是理想的伏击地点，却是我军出其不意打击敌人的好地方。正因为地形不险要，敌人必然麻痹。如果我军充分利用旧工事隐蔽伪装，变不利为有利，出敌不意、攻敌不备，定会起到出奇制胜的效果。

3月15日夜，陈赓率第三八六旅设伏神头岭。第七七一团埋伏在公路左侧，第七七二团埋伏在公路右侧，补充团设伏在对面的斜底村一带，其他小部兵力用于牵制日军，配合作战。16日凌晨4时，第七六九团一个营按计划向黎城守敌发起攻击，黎城守敌果然中计，迅速向潞城、涉县日军求援。天亮后，涉县增援日军紧急出动，很快被七六九团阻击部队击退。潞城日军派出1500余人的部队前去增援，结果在神头岭掉进了我军的伏击圈。第三八六旅三个团从三面向日军发起了突袭，伏击部队穿插分割，将日军截为数段。经两个小时激战，将潞城援敌第十六师团和第一零八师团大部歼灭。激战中，第七七二团八连连长邓世松身负重伤，在战斗最后一刻仍手持手榴弹向敌人进攻；一营一战士身负重伤，仍与敌顽强斗争，牺牲时手中刺刀还深深刺在敌人身上；二营一名战士负伤后，坚持向敌人投掷手榴弹，炸死炸伤数名敌人；补充团的很多战士，用红缨枪甚至石头缴获了三八式步枪。此战共歼敌1500余人，活捉日军8人，缴获长短枪550余支、轻机枪11挺、骡马600多匹及大批军需物资。

在神头岭伏击战中，我八路军将士不怕牺牲、奋勇杀敌，以顽强的革命斗志再一次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神头岭伏击战是八路军继平型关、长生口伏击战后，进行的又一次大的歼灭战，是坚持独立自主山地游击战的经典战例。陈赓称之为“典型的游击战”。

狼牙山五壮士中的叔侄英烈

□ 胡琳玉

1941年9月，在冀西狼牙山地区，八路军战士马宝玉、胡德林、胡福才、宋学义、葛振林，为掩护党政机关和群众转移，主动把日、伪军吸引到自己身边，一步步退到悬崖绝壁，据险抵抗。在打完最后一粒子弹后，他们毅然砸枪跳崖。人们称他们为“狼牙山五壮士”。

——摘自《中国共产党简史》第93页

胡福才（1913—1941年）和胡德林（1917—1941年），河北省容城县平乡郭村人，俩人相差4岁，胡德林叫胡福才叔叔。俩人立志抗日救国，于1938年同时参加八路军。1941年，叔侄俩在狼牙山阻击战中纵身跳崖，壮烈牺牲。

出生苦难立志参军报家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容城沦陷，日军肆意屠杀手无寸铁的老百姓，整个县城被洗劫一空。胡福才、胡德林与城里的百姓们外逃，开始了颠沛流离的流亡生活。1938年，八路军突然出现在容城附近。胡福才、胡德林听到后立即赶到城外，帮着八路军运弹药、抬伤员、送水送饭。经过一天一夜的奋战，容城终于被八路军攻下，日军弃城而逃。第二天，恰逢晋察冀军区一军分区一团在县城内扩军，叔侄立马前去报名。不久，俩人被分到了新兵连同一个班。他们很快掌握了各项军事技术，跟着大部队先后转战冀东、冀西，最后被分在了七连二排六班。战斗中他们身手矫健、出生入死、勇猛果敢，多次得到上级的记功嘉奖。

1940年春天，叔侄俩参与了狼牙山三条环形小道的改造，依据地形构筑了隐蔽工事，开辟掩体和通道，在各险要处设置了障碍，把多个险要关口变成敌人望之却步的要卡，狼牙山成了一座固若金汤的“城池”。这为1941年八路军赢得三次反“扫荡”的最终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参加粉碎“铁壁”破“合围”战斗行动。1941年8月，日军调集重兵7万余人，开始对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北岳、西平区进行大“扫荡”。9月24日清晨，3500多名日军带领伪军突然从四面八方对晋察冀军区第一军分区所在地狼牙山进行包抄，对我晋察冀抗日根据地进行“梳篦式清剿”。

为转移两万多的游击队和党政机关人员以及周边村庄的群众，杨成武司令员决定采用“围魏救赵”的战术，以应对日军的“铁壁合围”战术。狼牙山西南的三团和二十团从正面佯攻管头、松山、甘河一带日军，促使日军从狼牙山东北方向调兵增员，一团就可趁机掩护围困的游击队员与群众从狼牙山东北角的碾子台、沙岭子一线拢出来的缺口处突围。当然，还要留下一个小部队以阻击牵制敌人，让敌人误以为自己一直在和八路军主力部队作战，从而把敌人主力牢牢地拖在狼牙山，这个“疑兵”的任务交给了胡福才和胡德林所在的七连。

9月24日开始，二万余名八路军和群众向计划方向转移。到了黄昏时分，我军西南面担任佯攻的三团和二十团完成任务后，迅速撤出战斗，消失于茫茫大山之

中。9月25日拂晓前，转移的队伍已经跳出了狼牙山，“围魏救赵”成功了，“铁壁合围”战术被我军粉碎，而日军仍然以为我军一团主力部队还在山里被他们死死围住。

天蒙蒙亮，日军正沿着我军为他们设计的路线陆续而来，被六班连夜埋下的炸弹炸死炸伤40余人。出兵受挫，日军大为恼怒，立即调动了飞机向我前沿阵地轰炸。狂妄轰炸后，敌人展开进攻。敌我力量悬殊，不久我军兵力已不足一半，加之很多战士受了伤，七连主力部队必须赶紧撤离前往老君堂、龙王庙的方向。为掩护七连主力撤离，危难之际，胡福才、胡德林所在的六班主动请求留下来与日军继续作战。

纵身跳崖壮举威震狼牙山。太阳渐渐偏西，随着战斗的推进，子弹和手榴弹已经所剩无几，六班的战士们只能边打边撤。此时，胡德林看到山下“膏药旗”正插在地上，旁边铺展开一块硕大的红布——这是日军在给飞机报信，打算开展山地作战了。果然，过了一会两架飞机开始盘旋于狼牙山的上空进行侦察。如果这时六班选择向老君堂方向撤退，很可能会暴露主力部队和乡亲们的转移方向，后果不堪设想。为了更加有效地迷惑敌

人，给主力部队和乡亲们更加充裕的转移时间，5位战士主动放弃了退向老君堂追赶部队的计划，毅然地选择了相反方向的棋盘陀。

日军又开始疯狂“扫荡”。5位战士筋疲力尽，继续向山上撤离。黄昏时分，他们到达棋盘陀上三面绝壁的小莲花峰。敌人越走越近，战士们弹很快就悉数用光，便搬起石头砸向敌军。不久后，敌军重整旗鼓、蜂拥而来。班长马宝玉握着腰间的最后一枚手榴弹，拼尽全力朝敌人狠狠地投掷过去。随后，转过身吩咐大家，快上崖！敌人喘着粗气，紧随其后。

此时，五位勇士的衣服已破烂不堪，胳膊、大腿、脸上都被岩石和树枝划伤，但他们依然忍着剧烈的疼痛，向着小莲花山的崖边艰难地爬着。为了不让敌人拿到武器，马宝玉毅然把枪砸成两截。胡福才、胡德林等握着手中的步枪，即便有万般不舍，但还是把手中的枪砸坏后，扔进了山谷。

随后，马宝玉高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国共产党万岁”的口号，纵身跳下悬崖。胡福才、胡德林等战士，凝聚起身上海最后的力气也跳进了大山深谷，演绎了一曲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英雄壮歌。

《中国共产党简史》
人物·寻踪

为了新中国——革命烈士纪念碑碑文敬读